

写作曾深受周作人、沈从文影响

羊城晚报：有评价认为你的散文有冲淡古典之道。你是如何探索、形成个人风格的？

沈书枝：我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硕士读的是古代文学专业，从本心上来讲，个人是很偏爱古典文学的。但在写作过程中，其实很少引用古代的诗词，可以见到影响痕迹的，可能是有些文章里，在一些字词的选择方面，会倾向于选择一些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词汇。更隐秘的方面可能是一种对于古典情致的偏爱，比如这本《拔蒲歌》的书名，实际上来源于两首南朝民歌《拔蒲》，“青蒲衔紫茸，长叶复从风。与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我自

己后来没有再读古代文学的博士，用这个具有古典意味的情歌典故做书名，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自己所喜爱文学的一种纪念吧。

我个人的写作从模仿开始，我念大学时，最喜欢的是周作人、沈从文、废名还有汪曾祺的作品，读了不少他们的书。在开始写作时，学习模仿的对象就是他们。尤其是大学时写的一些乡土小说，以及一些关于乡土的散文，受沈从文和周作人影响的痕迹很明显。后来在写作过程中，才在语言上慢慢摆脱这种影响，转而用自己的语言写起来。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开始了自己的写作，虽然在精神上还是一直仰慕着他们，希望追随他们。

想写一部关于女性生活的小说

羊城晚报：你的写作似乎源自豆瓣，也因为豆瓣被更多的人知道。豆瓣上的写作又不同于其他网络平台。你的体验是怎样的？

沈书枝：我在豆瓣上写作，大概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已是第9年。曾经有几年时间，在豆瓣日记上发文章（豆瓣把发长文章叫做写日记）是一件很流行的事，或者说，在友邻中是一件很热烈的事情。有一个阶段，身为友邻的大家甚至会纷纷写同样的题目——看到别的友邻写了一篇，觉得自己也有话说，于是自己写了一篇。在这种相互激励的氛围里，出现了很多很好的写作者。我觉得豆瓣上的写作风气其实较为文艺，网络文学的痕迹在很多人身上并不明显，写得好的也大有人在。

这几年豆瓣的文学创作发生了一些转向，对于文艺作品的关注在下降，日记受到的关注已经变得很少。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网站，在上面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也感谢读者在这个平台上给了我最初的关注。直到今天我还是每天都上豆瓣，也持续在上面发内容，这是一个像自留的花园一样的存在。

沈书枝：我们跟乡土的关系并没有结束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访谈

羊城晚报：你将新作《拔蒲歌》称为“还愿型旧乡”之书。与过去的作品相比，侧重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沈书枝：这本书的侧重点应该还是关于皖南乡下的风物自然描写，延续了我的第一本书《八九十枝花》的内容，不过也有些变化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除了乡土的风物外，也第一

与自然亲近的力量在写作中显现

次掺入了这些年在北京所看到的自然，与租房、生活的个人经历。

羊城晚报：从《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八九十枝花》到《拔蒲歌》，你一直在书写乡村。何以对乡村念念不忘？

沈书枝：我是一个从小真正在乡村长大的人，所受教育是从小帮家里干力所能及的活，五岁开始，就和妹妹（我们是双胞胎）一起跟在爸爸妈妈和姐姐们后面下田打稻，抱稻铺子，第二年就学着割稻。春

天放去田里挖猪草回来给猪吃，放假的日子和妹妹一起轮流放牛。还有很多诸如如此类的事情。这种生活给我的影响是，它不仅使我对乡下生活有一份真实的感受，人也在做事的同时，浸润在自然里。它使得一个人在天性上觉得乡下与自然可亲。这种可亲当自己还在家乡时未必会意识到，随着读书工作渐渐远离地方之后，才逐渐明显清晰。当我开始写作，这种情感渐渐显现它的力量。这是我

熟悉的一份生活，因此自然就选择了把笔写向它。写了三本书还没有结束，是因为家乡对我来说不是“故乡”，不是一个过去的幻影或凝滞的琥珀。它仍然存在于那里，这些年在外表上没有很大的变化，虽然实际上内里已变得很荒凉。我爸爸也仍旧回到了家里种田，我们每年还要回去好几趟，这份生活对我们来说仍在延续，因此很自然地想把正在发生的当下也写进去，而不是只有一个多愁式的凝视回顾。

想要记录现在的普通乡村生活

羊城晚报：对植物的喜好和描写是你的散文写作比较显著的特征。为什么对这个方面特别感兴趣？

沈书枝：如上面所说，这大概和我从小在乡村中长大的经历有关，人与自然得以接近，不知不觉形成了对植物的喜爱。因此在这些年认识了一些江南常见的植物，到北京工作以后，也把这边城市里的一些常见花木渐渐都认识了，这好像是在和一个城市打招呼，渐渐了解了一个城市四季的变迁，是真正在心里接纳的第一步。

羊城晚报：《拔蒲歌》从写作到出版历时五年，延续了第一部散文集《八九十枝花》的写作内容与情绪。对于不断写作的题材，如“故乡”“童年”等等，在写作的过程中，你会产生新的认识吗？

沈书枝：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吧，但也不很确定是否真的有深入一点的想法。我写《八九十枝花》时，还可以说是纯然的童年生活记录，花草也好，饮食也好，人事也好，可写的回忆很多，随意捡拾，便有纷至沓来之意。到《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则有有意完整记录下家里姐妹五人的成长经历，希望从中看出皖南乡下一隅普通人家过去的生活与当时的种种，是一种类似于“已经消失的小路”的生活记录。

《拔蒲歌》里，我则开始想要记录现在的普通乡村生活，不是牧歌情调的渲染，也不是荒芜凋敝的哀叹，只是想写去比较真实的生活。我去年回乡下较多，一年中回去了四五趟，每一趟都断断续续在家里住了一个月左右。本意是想记录我爸爸四季种田

的工作，他已经老了，很快就要种不动田了。这一年我重新认识了乡下的四季。当人成长以后，再回到家乡，你所认识的，实际上跟过去的认识是不相同的。

首先它是一种风景上的触动，过去的风景以一种熟悉而又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你面前，过去的生活经验和长大后所积累的审美经验，同时作用在身上的时候，你所感受到的触动，其实是远远超过或大于小时候所感受的。其次是更为真实地了解了一些现在生活在乡下的人的生活。除了普通印象中的老弱病残以外，也有一些壮年还生活在那里，他们也都有着一些各自为生的工作，你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很劳累但是有时候也很较劲的生活。乡下虽然是在一种衰落的过程中，但随着时代发展，实际上也有一些新的生活方

式渗透进去，比如农村的路修好以后，很多在镇上卖东西的人，也会骑着电动三轮车或是开着小面包车，把东西带到乡下，送到人家门口去卖。吃穿用度都有，很多时候会是一些劣质产品，乡下的人可能不知道，同时他们对品质这件事有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接受，所以能看到一些真实的生活面貌。

羊城晚报：文学与地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李娟的阿勒泰等。芜湖南陵在你的写作里扮演怎样的角色？

沈书枝：我的写作虚构的痕迹很少，南陵就是我的家乡，是我写作的来源吧。至于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之乡，目前其实没有那样的想法，我希望自己是在家乡背后，为它服务，做一点自己能做的如实的记录。



政治鼎革、经济发展与民国社会生活变动

《民国社会生活史》读后

王瑞芳 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政治鼎革和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变革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了将中国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多月中，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进行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变革，直接以政治力量推进社会变革。

“自由是新风尚”，这是对民国初年社会改良的最好概括。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成为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新潮流。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改革，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使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辛亥革命以民国取代帝国，诚然来得过于急骤，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政治组织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袁世凯复辟帝制及此后形成的北洋军阀混战局面，使中国社会再次陷入了黑暗、混乱之中。但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合乎世界现代化发展方向，它推翻了中国相沿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使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而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

辛亥革命后的新政治形态固然引起了民国初期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则直接导致了民国时期民众社会生活的变动。民国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发展，出现了所谓“黄金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提供了难得契机。西方列强因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民国社会生活变革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民初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结构日趋瓦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空前壮大。建立于地缘和血缘关系之上的封建宗法社会逐渐瓦解，传统的会馆、宗族组织日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业缘为主的新式经济团体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和重组，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动，同样导致了民国社会生活变革的深入和近代新式生活方式的发展。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新式生活方式得以流行，中国民众的衣食住行、婚嫁嫁娶、节日节庆、娱乐休闲、宗教信仰和社会交往习俗，都发生了剧烈变动。政治鼎革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推进了民国时期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动和社会生活的变革。

社会生活的变革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而社会结构变动必然带来民众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变化、变动和变革，是民国时期民众社会生活发展的突出特征。

西方近代文明给予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最突出的还是器物层面的变革，是西方近代工艺、技术传入中国。洋务运动兴起后，西方近代生产及生活器物开始传入中国沿海城市，如洋布、洋火（火柴）等，还有蒸汽机、酒精灯、显微镜等，逐渐改变着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甲午战争后，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开始由器物文明深入到制度文明，逐渐关注并接受西方君主立宪及民主共和政体。到了民国初期，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教育等，以及西方思潮、学说都先后传入中国。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规模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民众生活习性差别甚大，存在着众多的差异。这些差别，导致了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变革的不平衡性。如果忽视这些差异，易于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毛病，无法窥得民国时期民众社会生活的真相；如果过分夸大这些差异，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很难总结出民国时期民众生活变动的脉络。因此，考察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动，必须首先关照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和各阶层民众之间的差异性，这些差异带来了社会生活变化速率和变化深度的差异，从而使民国社会生活的变革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受西方新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辐射的强度，相应地从沿海沿江的口岸城市及东南地区到内陆城市及乡村，呈现逐步减弱的态势；从沿海沿江大中城市向在内陆乡镇及乡村，同样呈现出逐渐减弱的态势。这样便形成了像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沿海沿江城市异常“摩登”而广大内陆城市及乡村社会生活变化不甚明显的发展不平衡性。

城市生活现代化，在社会生活变革中具有先导和火车头作用。民国时期民众生活世界的变革，首先是从小城市开始的。自晚清上海、天津、广州等早期通商城市社会生活领域出现变动，直至民初伴随政治鼎革和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变革的潮流向内地其他城市扩展，沿海沿江各口岸城市新生活元素成为引领民国社会生活现代化变动的播种机。近代城市生活的突出特点是消费性和商业性，商业繁荣、人口流动，市民生活市场化、消费欲望增强、消费能力提高、社交需求加大，特别是西洋消费品引入、新消费形式出现，共同催生了城市消费商业、休闲服务业的发达。民国城市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与广大内陆乡村的传统生活场景，形象地诠释着民国社会生活变革的区域不平衡性。

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变化的不平衡性，还体现在中国各阶层社会生活的明显差异上，体现在城市社会上层精英与乡村社会下层百姓生活方式的差异上。从总体上看，城市民众的社会生活变化，快于和大于乡村民众的社会生活；城市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变化，快于和大于城市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受过教育和教育程度高的城市民众的社会生活变化，快于和大于没有受过教育或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

中西杂糅、新旧并行构成民国社会生活的总体特征

西方近代新式生活方式传入中国并逐渐流行，逐渐成为民国社会生活发展的潮流。但这样的生活变革潮流是在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进行的，这便决定了这样的变革不可能骤然中断中国民众的旧式生活传统，更不可能骤然仿行西洋新式生活，必然会沿着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惯性继续前行。这样，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变革的基本趋向，就是趋新与守成同时并行，激进的变革与传统的情性同时发力，进而形成了“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总体特征。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与西洋近代生活方式的矛盾、冲突与调适，是民国社会生活演进的基本趋向。中国民众的生活传统，尤其是成为民众日常生活规范的社会习俗，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强大的、持久的力量。在民国时期采用阳历、废除中医、推行新式婚丧礼仪等问题上，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这些冲突和矛盾中，貌似强大的政治势力和貌似进步的西洋近代习俗依然无法根本取代那些看似弱小的民众守旧的传统社会生活习俗，最后不得不采取调适之策。这种情况说明，民国社会生活习俗的变革具有明显的缓慢性及渐进性，决非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所能解决。

社会风俗有良风美俗与恶风陋俗之分，上层社会的移风易俗，往往是利用上层的优势政治资源，对下层社会施展其影响，以倡行良风美俗，而革除恶风陋俗。然而，这种立意高远、初衷甚佳的社会变革举措，由于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强行推行，容易受到社会下层的消极抵制，收效无法持久。下层民众传统习俗的强大与顽固，往往超出当政者的想象，它对上层社会的影响是无形的、持久的，经常会迫使社会上层不得不采取妥协与调适态度。所以，如果政府推行的社会变革之举，合乎民众改变旧的社会习俗的愿望，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

在尊重传统习惯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正确的引导，采用渐进的方法和稳妥的步骤革除恶风陋俗，尤其是如果能很好地处理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之间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是完全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的。

由此可见，社会变革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它远比政治革命困难，也更具有渐进性和缓慢性。政府在推行带有移风易俗性质的社会变革时，必须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在剧烈的对峙与冲突之后，政府与民众必然要进行妥协与调适，寻求“渐新渐胜之道”；新旧势力之间的妥协与调适，乃社会进步之常态。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演进，正是在这种上层与下层的对峙与调适、新势力与旧习俗的冲突与妥协中进行的。

“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总体特征，集中体现在民国时期的婚丧礼俗变革中。随着民国时期婚丧观念的变化和婚姻制度的变革，文明结婚、契约结婚、公葬、国葬、追悼会等各种形式的新式婚丧礼俗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但中国传统婚丧礼俗并没有退出民国历史舞台。传统婚丧礼俗尽管经历了新思潮的冲击已经有微弱变化，但仍然还是相当强大的影响力，仍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除了上海、北平等沿海沿江和内地大中城市外，绝大多数地方仍然按照旧式婚丧行事，虽偶有采取新式婚礼者，也是极少数。而旧式婚丧和婚俗下的许多恶习陋俗，如童养媳、抢婚、转婚、闹房、纳妾、守节等，仍然比较普遍。

从总体上看，民国时期旧式的传统礼俗尽管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和陋习，但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新式社会礼俗尽管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因为有着很多的优点和长处，却显示了无限的发展潜力。延续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剧烈变动的近代生活方式同时并存，从而使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复杂图景。

《民国社会生活史》作者：左玉河 定价：280元(共两卷)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